

个人生活史

(1949—1978)

金光耀 戴建兵 主编

本能与理性：革命时空中一名普通工人的个人生活史

不离不弃还是劳燕分飞——右派配偶的痛苦抉择

从《溥仪日记》看溥仪的公民生活

“圣徒”心态

日常与非常：一个苏州评话艺人的1949

耕牛、国家与民俗：合作化运动中的“吃牯脏”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个人生活史

(1949—1978)

金光耀 戴建兵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人生活史：1949～1978/金光耀，戴建兵主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671-2008-2

I. ①个… II. ①金… ②戴…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中国-1949～1978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321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章 斐

个人生活史(1949—1978)

金光耀 戴建兵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丹阳德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008-2/D·180 定价：34.00 元

序言

戴建兵

读大学历史系的时候就在想，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现在的学生，在一个就业已经对学生在校心理造成巨大压力的时代，和我当年一样，多多少少都会想一下这个问题吧。

历史能给我们个人生活或个人人生的智慧吗？历史能走出大格局或大历史，宏大叙事而在微历史时代给我们个体什么呢？或者，我们个人的生活又能给大历史什么呢？

反过来问，我们看似一个个布朗运动的个人生活，对一个时代、一个源流、一个运动、一个事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从微历史中重新回到宏大述事，难道不应当思考吗？

我们在历史的潮流中如何才能达到完满的人生，是引领、叛逆还是随波逐流，大隐隐于市或是逍遥派，引领或是潮流的反对派，思潮的反对者或是行动的支持者，或是几种的集合体？

什么样的选择才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像经济学说的那样：经济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选择的学问；同时还不知真假地说，和物理学相比，他们还处在炼丹术时代。与此同时又特别强调，经济学的语言是数学，他们在追求科学性。

历史构造文化，在文化中我们就只能如何被文化吗？而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人们又如何选择？

个人的历史就没有科学性了吗？我们如何才能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通过历史增长自己的“悟”性啊？

历史学能让我们选择什么？职业、兴趣、革命思维、传统、教师、道德的化身、社会的良心，还是有钱的公知？

历史能从领袖的思维里走出来，直入我们微观的个体，并引领我们的生活和选择吗？除了掌握全局的人物或其智囊会认为历史有用，那个体的思考呢，个人的作用呢？

1949年至今的个人生活史，可能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

为什么？

一是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汇集了无数个人的智慧和万花筒一样的人生。

二是因为这是最波诡云谲的时代，汇集了无穷的人性善恶。

三是因为这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时代，我们就生活在这里面。

单纯地从学理上讲，我们就可以思考：

个人与国家控制，阶级斗争视阈下的个人与生活，个人生活与群众运动，个人权利、阶级分属与社会义务，选择是权利吗？如果大面积压缩个人权利与自由，社会受益的是什么？个人权利压缩有哪些好处？控制、改造还是再造新人，成功了吗？

历史的眼光，也许就是知识分子的眼光，就是对历史和未来更加负责的义务，个人历史对于个体演化的历史，会成为其意识事物的真理。个人生活，历史中的个人，个人和历史。

市场经济使个人要素最大化。而在经济被管制、计划的时代，因为个人没有经济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规划的人生，但是就是人生力图被生产，政治努力统一的意境下人们还是会有不同选择，历史也会让其生活充满光彩。野花也有自然的春天，并因此而趣味无穷，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现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些。

一切中国的事物，实际上都不要过分迷恋西方理论，而是要鉴定西方的理论，不仅在学术综述上要下功夫，直接实践更为可贵。回归现实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人民群众、英雄将相创造历史，他们

都是人，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无论政治史、经济史，都是人类史。就像人类学说的那样：文化即生活。

我们所学终究是人类智慧的方法论，因而个人生活史总会给人以智慧。也许这种对于个体而言介于直接和间接经验之间的东西，恰恰就是其情趣和意义所在。

目录

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 戴建兵 张志永 1

耕牛、国家与民俗：合作化运动中的“吃牯脏”研究..... 李飞龙 13

从《溥仪日记》看溥仪的公民生活..... 李慧娟 29

不离不弃还是劳燕分飞——右派配偶的痛苦抉择

..... 齐春风 40

“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顾准先生百年冥诞祭..... 王 征 57

革命洪流中的平凡生活——以江西小三线建设工人

伏如山 544 封家书为中心的初探..... 徐有威 杨 帅 78

“圣徒”心态..... 杨宏雨 张 熙 93

个人自传、自我检讨与建国初期的柳无垢..... 张 杰 114

本能与理性：革命时空中一名普通工人的个人生活史

..... 张志永 122

日常与非常：一个苏州评话艺人的 1949..... 解 军 139

20 世纪 50 年代地方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研究：以夏佩白	
为个案的考察	徐 迟 150
朱永嘉口述	金光耀 165
中国知识分子的逍遥与坚守——以《无罪流放：66 位	
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为中心的研究	杨瑞宁 180
人性的抗争与湮灭——以郭小川对“丁、陈事件”的	
检讨为中心的研究	周绪情 198
“空军子弟学校”社群探究	姚振黎 212
能否实现中国史的《奶酪与蛆虫》？——从河北省	
昌黎县一个农民的视角来看阶级政策	河野正 268

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河北师范大学 戴建兵 张志永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外学术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不断传入，大陆史学界出现了重大转向，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快速隐去，政治史、军事史等热点课题称霸格局不再，而同时关于“草根阶层”的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但草创不久的社会史理论、方法和资料等多不完备，涉及领域尚不全面；就个人生活史研究而言，起步更晚，研究论著寥寥无几，且可圈可点者极少^①。故本文力图从概念、资料和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一、个人生活史概念：兼与西方私人生活史之比较

社会史研究肇始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西方的新史学派诞生后，史学研究迅速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有限范围，扩大为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社会总体史，从研究上层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社会大众，开辟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等新研究领域。正是在新史学勃兴的学术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拓展了私人生活史研究的新

^{*} 原载《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① 截至目前，国内关于个人生活史的研究论著大都限于民俗、教育方面，直接涉及历史学的很少。其中，代表性的论著有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李辉编《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清秋子《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等。

领域。他们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主要收集、利用民间各种私人记录,描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

受海外史学研究新理论、新方法输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之一,至今方兴未艾。“没有人会再认为,历史学只能研究王朝兴替、农民战争等重大事件,而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不过是些不该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碎片,社会史已经完全确立了作为一个学科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地位”^①。然而,学术界研究社会史的内容很不平衡,与婚姻家庭、灾荒与救济、妇女等专题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关于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乃至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大问题有待厘清,即如何对个人生活史进行定位?中国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能否完全借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研究模式?这两个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却涉及该领域研究的概念、资料和价值等重大问题。

“概念的价值何在?概念的形成是推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②。时下许多学者忽视或忽略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教条式地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来界定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往往导致削足适履的弊端。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对分离,如英国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形象地说明了在私人领域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基本准则。

在此准则下,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对象是不受法律管辖的“墙壁后”的生活,“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

① 常建华等:《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② (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从下层社会的家庭争吵，到上层社会的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多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其突出的特点是，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当然，它并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也不是要刻意地记录一些趣闻逸事，而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它的背后是国家^①。

与西方相比，中国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特点，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互融合。《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社会干预非常广泛而有力，故中国几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更有甚者，公共生活还极大地侵蚀了私人生活的领域，不仅使私人生活的神秘性大大消退，也为其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使琐碎日常生活内容泛政治化、公共化。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然而，曾几何时，这些条文徒有其名，国家对社会干预和控制亦达到了史无前例之严密。譬如，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把分散的个人统统整合为地方人和单位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集体化运动大大压缩了家庭的作用，除了基本的生活功能外，传统的生产、教育等功能丧失殆尽。甚至“大跃进”时期广大农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②。乃至人民公社将社员按生产需要机械地

① （法）菲利普·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李群等译：《私人生活史·序》（第1卷），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447页。

拆分开来,老、幼、男劳力、女劳力等分住数处,致使广大农民血缘、伦理意义上的家庭一度都被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又为家庭的生活功能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五七干校”在事实上取消了部分家庭,夫妻随各自的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妻离子散。总之,个人生活几乎失去了自由,私人生活空间被压缩到近乎无的地步,家庭沦为单纯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遑论什么“免除干扰的、自省的、隐匿的领地”的个人私密空间。

鉴于东、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自然不宜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以免产生概念上的歧义,累及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故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应该选用内涵比较广泛的“个人生活史”更为合适。可大致定义为:个人生活史是在国家严密控制社会时期个人的观念演变和行为选择的历史。具体而言,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时期,国家公权过度干涉私权的情况下,个人相应的自下而上的理性反应和应对;它不是“草根阶层”的奇闻轶事,更不是所谓野史、稗史,而是一部反映日常生活并超越日常生活意义的客观历史记录,映射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迁和演化。它与西方私人生活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研究领域和内容上不一样。一是在研究领域上,除了西方概念上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外,还包括部分公共政治空间,甚至后者更为重要;二是在研究内容上,除了西方概念上的纯粹的私人日常生活外,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部分。当然,中国个人生活史与西方私人生活史也有许多共同点,诸如所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民众,研究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社交网络、节日庆典等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生活内容。

显然,在当代中国特殊国情下,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纯粹的私人生活史,故厘清中国个人生活史与西方私人生活史的界限,是

开展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前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先进理论以阐释中国历史并无不可,但须注意到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宜照抄照搬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强解中国个人生活史,而应在深入理解外来理论与立足中国国情特殊性的基础之上,辩证地开展中国化的个人生活史研究。

二、开展个人生活史研究的资料依凭：兼论个人档案与其他史料之比较

傅斯年曾言：“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①梁启超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②因此，研究和发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就必须利用可靠、翔实的研究资料。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不是资料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料繁多，甚至多到人们无力、无法将其收集完全，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地采择最权威、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来说明问题。

就个人生活史研究的主要资料而言，大致包括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私人记录，田野调查资料，个人档案等三种，三者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权威性各有短长，若单纯依赖一两种资料进行研究，很容易以偏概全，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把三者比照而观，取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方可取长补短，比较客观、全面地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提升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水平。然而，一些学者在研究个人生活史时，往往存在着不善于采择资料的问题。或照搬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过于偏重田野调查，或强调使用日记、书信等私人记录和回忆、访谈等

① 《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均属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实,较好地保持了史料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私人记录难以避免诸多避讳或矫饰,口述史料、回忆录等亦有事后追忆的先天不足;基于口述者个人情感的偏向、记忆的误差或其他隐情,易生无根之谈,自然其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即便参照报刊文献,但因其过于注重政治性、宣传性而时有报道失语或报道失真的现象。如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报道就是典型的例子,那时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但报纸上依然是胜利跃进的热闹场面。显然,以片面、不确的资料为研究依据,无法得出真实和客观的结论。

与之相比,个人档案比其他民间记录的史料价值更高,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等特点。它反映了长时段的生命历程,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个人经历、思想等发展的重要节点,展现其工作、生活乃至家庭等情况,甚至有个人向组织汇报而不能向他人(包括家庭成员)言说的隐秘等内容。同时,人事档案中的思想汇报、组织结论等无一不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个人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可弥补私人记录、田野调查等资料的缺陷,诸如补全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节点,校正口述史料的失真、失实的偏差处,为口述者提供回忆的线索,甚至不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工作和生活的事例,如果善为利用,以其作为个人生活研究的基本史料,再综合日记、书信和田野调查等资料,必然使个人生活史研究得以深入和展开。

当然,个人档案也存在着若干缺陷,使用时需要注意辨别,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档案覆盖面小,除了干部、工人、学生和军人以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外,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个人档案;二是人事档案是官方对个人的选择性记录,记载的内容不够全面,不同时期的记载内容详略不一,一般在退休后即停止更新,不能覆盖主人的一生;三是个人档案记载信息可能存在若干误差,乃至可能是冤、假、错案,严重的还有人为捏造和造假等问

题。因此,研究者在利用档案时不应过于迷信其权威性,而是应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其他资料,综合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日记、书信、口述史料、报刊等其他文献,进行比较和分析,或许这样可以比较真实、客观地认识个人生活史的全貌。

由是观之,个人档案记录了社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历程,是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基本史料。研究者应充分挖掘、利用好个人档案资源,如实地讲述寻常百姓不平凡的故事,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有助于梳理历史演变的整体线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缓慢而深刻的巨大变迁。

三、以小见大：研究个人生活史的价值

中国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非西方国家那样躲在“墙壁后”的纯粹家庭、个人的私生活,这就决定了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比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多方面研究价值。

首先,以个人档案为基本研究资料,丰富了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内容。王国维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就个人生活史研究而言,个人档案无疑是最新发掘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也是把个人生活史研究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有学者概括道:“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兴盛发展更需要注意对相关档案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搜集、整理和利用,这或可称之为场新的‘资料革命’。其实,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往往也意味着新的解释方法、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这对于社会史研究领域而言,尤其如此。”^②

把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阶层”的个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

① 《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② 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第42页。

象,乍看起来似乎难以匹敌上层社会精英、英雄模范等典型人物,然而历史研究中往往存在着“典范”与“代表”之间的悖论。精英人物、英雄模范固然具有高度的典范性,但典范本身意味着“高、大、全”等较高的标准,这恰恰是大多数人所难以企及的,故“典范”反而不能代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与之相反,一个默默无闻的升斗小民,却因其“普通”而具有标本性,能够代表真正的普罗大众。同理,社会上散落的个人档案的主人几乎都不是精英人物,甚至也远谈不上典型,但正因其名不见经传、平凡无奇,恰恰反映了庞大的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故研究者可以把个人档案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借鉴“从底层看历史”的社会史研究模式,从微观史角度再现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变迁,更能够丰富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内容,拓展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

有国外学者指出:“生活史(或生涯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去研究一个个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的成长经历,研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在这些经历和看法中渗透着他们自己的解释。”^①事实确实如此,通过用社会史理论和方法解读个人档案,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社会民众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理性抉择和观念的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前,国人在购买短缺、紧俏商品时必须有票证,主要涉及“吃、穿、用”三大类,诸如粮票、油票、煤票、布票、自行车票、钟表票等,即便有钱但无证仍不能购买商品,可以说,票证对社会基层民众的婚丧嫁娶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至为重要。笔者在翻阅个人档案中,经常看到一些生动的票证事例,形象地反映了在物资短缺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对策。例如,笔者翻阅辽宁省盖县土杂公司更夫梁明福的档案时,看到一份组织结论:“该人自参加工作以来,工作比较肯干,一般的能够完

① (英)麦克南著、朱细文等译:《课程行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成党所交给的工作任务，但由于该人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私心严重，在做采购员期间，曾利用联系工作之便套购粮票、豆油等物资，还以手表换粮票，向私人索要粮票，在对外地采购关系上造成不良影响。”从中可以发现两个梁明福，一个是工作吃苦肯干的人，另一个是套购粮票有投机倒把之嫌的人，何以出现这个矛盾？笔者在另一份证明人的材料中看到了如下记载：“我于(19)71年11月中旬在牡丹江东方红旅馆第七号房间，认识同住盖县土产公司采购员梁明福。有一天他在房间吃面包，我问他你为啥这样艰苦。他说我家孩子多，我的口粮放在家里，我这是在车上买的不要粮票的面包。”^①通读整本卷宗，在感慨当时政治说教和社会管控之严密的同时，还从朴实无华、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诉说中，理解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梁明福的所作所为，他工作比较肯干，而不是好吃懒做，说明他本性勤奋、善良；他买不要粮票的面包和设法兑换粮票等，只不过是为了让家人多吃点粮食的谋生手段，结果被扣上了“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私心严重”等政治大帽子；梁明福的一切努力与当时的高度政治化社会环境不合，但都是为满足家人温饱的理性行为，足以反衬出梁明福是爱家的好丈夫和好父亲。显然，通过用社会史理论解读个人档案，更富有人情味和冲击力，比单纯的宏大叙事、理论推演更易令人理解和信服，这也符合社会史研究的真谛。

其次，以小见大，再现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细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等宏大叙事主宰了历史学研究，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往往被意识形态化，乃至异化成为原因、经过和经验教训等问答题式的说教，而历史中的人则被“许多”“大多数”等特称判断和“人民”“群众”等全称判断所取代，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隐没不彰。

① 《辽宁省盖县土杂公司更夫梁明福档案》，笔者收藏。